

萨特存在主义精神 分析理论中的“他者”问题

项颐倩

摘要：“他者”观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是萨特存在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者”问题也是研究萨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必须深入讨论的重点。萨特进行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实践的四部传记作品分别体现了其以身体为中介的早期“他者”观，以及以“集团”为特征的后期“他者”观。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视阈下关照“他者”问题有助于深刻理解萨特以个体命运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建构。

关键词：萨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他者

DOI:10.13658/j.cnki.sar.2017.06.016

作者简介：项颐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理教授。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7)06-0125-07

萨特剧作《禁闭》中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一直以来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这句话经常被用来描述现代人在现实处境里面对他人所遭遇的孤独感和敌对情绪。这种解读显然具有片面性，因为“他人”或“他者”（les Autres, autrui）在萨特的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继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他者”概念之后，萨特将这一概念引入存在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萨特独有的“他者”观。“他者”观也成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核心问题之一。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他者”的阐述以人的三种存在为起点，即“自在的存在”（l'être en soi）、“自为的存在”（l'être pour soi）以及“为他的存在”（l'être pour autrui）。其中，“自为的存在”代表自由本身，而在向着自由努力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为他的存在”这一中间状态。因此，萨特关于“为他的存在”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对“他者”的理解。同时，萨特在对“为他的存在”的论述当中提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旨在说明“他者”问题是理解人的存在的重要环节，而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是理解人的存在的基本方法，所以二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国内学界有关萨特“他者”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深入，然而针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与“他者”的关联性研究则相对薄弱。萨特关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的作品有《波德莱尔》（1947）、《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难者》（1952）（以下简称《圣热内》）、《词语》（1964，又译作《文字生涯》）与《家中的低能儿：1821—1857年间的居斯塔夫·福楼拜》（1971—1972）（以下简称《低能儿》），其中《圣热内》与《低能儿》尚未在我国翻译出版。本文结合上述几部作品，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的角度对萨特的“他者”问题加以梳理和分析。

一、萨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

萨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的目标是对人进行整体化理解,该方法的理论起点是存在主义哲学观的核心观点——“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认为,“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①基于这种观念,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作为个体命运的研究方法提了出来。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萨特接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念,如重视童年经验,但是他反对弗氏理论中把本能作为心理发展的基本驱动力的观点。另一方面,萨特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因其能够准确定义不同人类群体的性质,但是他认为“阶级”概念对于研究个体命运尚嫌不足。萨特希望找到一条不同于上述二者的研究方法,能够合理解释个人的人生轨迹和命运,这就是他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

萨特反对将任何人类活动归结为意向性,即特定的动机(motif)。他认为“动机说”不能从根本上对人类行为做出解释,必须要考虑动机的深层原因,即“一个动机(或一个动力)何以能成为动机”。^②萨特指出,无数看似偶然甚至不同的动机背后常常隐藏着同一个“原始谋划”(projet origine),“原始谋划”才是理解人的各种行为乃至命运的钥匙。萨特在撰写《存在与虚无》时首次提出“谋划”这一术语。该术语从海德格尔提出的现象学术语“筹划”(entwurf)衍生而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谈及人的“此在”(Dasein)时提到筹划的概念。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就是它在其“本在”(être)中尚不是的东西,筹划伴随着此在,只要此在存在,就无法回避筹划,筹划关系到在世的整个展开状态。此在通过本在的领会及筹划得以建构,最终“成为你所是的”。^③此在的超越性一目了然。萨特提出的“谋划”概念部分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筹划”含义,即承认筹划的意义。他们的分歧在于,海德格尔的“筹划”指向的依然是具体谋划,即动机;萨特则认为具体“谋划”具有可变性与多样性。发掘各种谋划背后的共性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只有在不可还原性面前才停止下来”。^④这是指在对主体行为动机的分析过程中,逐层分解再还原,直至不可还原时所遇到的那个谋划就是“原始谋划”。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原始谋划”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关键性的逻辑化解: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类似实在于个别之中。没有后者,前者则是一种知识化抽象,所以处于现实历史之中的个人谋划必然有两个基本特点:它在任何情况下不能由概念来规定;但作为人的谋划,它却是永远可以理解的”。^⑤精神分析学从此摆脱了机械论和经验论的老生常谈,为个体命运的解读打开新的思路。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具体方法是追溯主体的童年经历,还原主体的“原始危机”(criseoriginelle),并进一步揭示人“原始谋划”,最终证明所谓命运完全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原始危机”必定是由某个或某类事件引发的,在以往的研究当中,这些事件因其表面无足轻重未能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就是要对主体童年时期发生过的各类事件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从中发现“原始危机”的蛛丝马迹。萨特在他几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批评作品中,追溯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四位作家的童年生活。虽然这几位分析对象无一例外地都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但是他们所遭遇的“原始危机”各不相同。波德莱尔人生中的原始危机是其母的再

①④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4页。

②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31页。

③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8页。

⑤ 张一兵《历史总体化的人学辩证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解读》,《学术月刊》2003年第10期。

婚事件,让·热内遭遇到的人生突变则是他第一次盗窃行为被其养父母发觉,福楼拜的原始危机是其母偶然发现了他的阅读障碍,而萨特本人面对的则是其父的英年早逝。“原始危机”一旦产生,主体的“原始谋划”也应运而生。波德莱尔的原始谋划是为自己制造女性化的外壳,而热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窃贼,福楼拜为自己谋划了癫痫病的重疾,萨特则走进外祖父的书房开始了早慧儿童的文字启蒙。所有这些“原始谋划”都具有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对抗来自“他人”的非议和质疑,为自己寻找一线生机。从上述的实例分析中,萨特发现:存在的“原始危机”都是由“他人”引发的,在“他人”的觊觎下,人自身的存在深感“危机”;为了消除这个“危机”,人必须进行“原始谋划”,即“个人设计”,选择一种“自为的存在”。这种“原始谋划”是对“他者”的一种叛逆或反抗,隐含着“为他的存在”。总之,人的选择存在着主体与“他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正是萨特早期的“他者”观所阐述的观点。

二、早期以身体为中介的“他者”观

萨特认为,研究“他人”是对人进行整体理解的先决条件,因此“他者”是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研究的重点。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反复强调“他人”的重要性:“我们从我思中发现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也发现了别人。与笛卡尔的哲学相反,也与康德的哲学相反,当我们说‘我思’时,我们是当着别人找到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对于别人和对我们自己同样肯定。因此,那个直接从我思中找到自己的人,也发现所有别的人,并且发现他们是自己存在的条件。”^①这意味着他人的存在向我揭示我的存在,“他人”是自我认知的必要途径,并且这种关系可逆。

研究“他者”问题的意义还在于,我和他人互相负有责任,我与他人的自由互相依存、互相限制。在处境当中,人的自我选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群体中的他人。“当我们说人自己做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做出选择;但是我们这样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做出选择。”^②因此,任何个人的自由依赖于别人的自由。萨特认为,这种情况尤其是针对群体中的个体而言,因为“我不能把自由当作我的目的,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作自己的目的”。^③

萨特的“他者”理论发展根据其特征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存在与虚无》时期代表早期阶段和《辩证理性批判》时期代表后期阶段。从理论渊源来看,萨特早期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某些“他者”理论。这一时期萨特的“他者”观可以概括为“他人即是地狱”,“他人”特指与自我相冲突的他人。此后萨特从理论和实践两面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在这一阶段,萨特开始用辩证法完善“他者”概念,并进一步证明主体的谋划是个人他者和集团他者综合影响下的产物。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的实践方面,《波德莱尔》和《圣热内》体现萨特第一阶段的“他者”观,《词语》与《无能儿》则对应其第二阶段的“他者”观。

萨特在其“他者”观形成之初,以前人理论成果为基础考察了意识问题。但“萨特重新回到意识,并不意味着萨特对意识的看法与笛卡尔、胡塞尔如出一辙。因为他不是从反思的‘我思’出发来进行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是立足于‘反思前的反思’的存在来揭示意识的本质、变化与存在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清理‘我思’是为了反抗唯我论,来说明他人的存在,说明他人与我的存在的存在关系”。^④萨特站在现象学的立场批评了19世纪以来关于意识的某些实在论观点。这些观点认为世界是思想实体即主体直接的中介,一切主体之间的思想交流都必

①②③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22、9、27页。

④ 王振林《萨特的他者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须依靠所谓的独立于心灵的物质世界,这一论调使对意识的考察退回唯心论的立场。萨特认为,身体才是必要的中介物,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过程中隔着两个身体:首先是我的心灵和我的身体,其次是我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最后是他人的身体和他人的心灵。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也认为意识依靠身体对他人、它物进行感知,因此身体是连接外部世界自然物体和内部世界的中介,同时也是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构成精神世界的最基础材料。萨特则从心灵不在场的特性出发,指出身体作为实在物无法被跨越的特征,心灵之间的交流必须经由身体感觉的交流来完成。此外,身体之间的区别导致心灵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是交流障碍乃至敌对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于身体实现中介作用的方式,萨特认为“注视”,即“他人的注视”最为普遍。他人的注视显现我与他人之间的原始关系,向我揭示我当下的存在。由他人的注视所引发的我的各种情绪中,“羞耻”则最能够体现我的“为他的存在”。而我想要否定这个存在,这就是“自欺”(mauvaise foi)的根源。“自欺”是自我否定,其本质是“我是我所不是”或者“我不是我所是”,我通过“自欺”来掩盖或者逃避自己的羞耻感。^①

在《波德莱尔》一书中,萨特分析了波德莱尔面对“他人”目光时的反应。据不少资料记载,波德莱尔日常打扮矫揉造作,且喜爱穿着具有女性特质的服装。据此,国内外文学批评界一直以来倾向于将其形象定义为浪荡公子哥甚至同性恋。萨特指出,波德莱尔的外形并不符合19世纪以强健体魄为标准的浪子形象,同性恋的说法也站不住脚。萨特认为衣着打扮是波德莱尔用于对抗他人目光的伎俩。波德莱尔厌恶他人肆无忌惮地打量自己,因为目光的发出者会根据经验主观地给他贴上某种标签。而女性化的装束能够像盔甲那样为波德莱尔提供安全感:别人认为他是娘娘腔,而他恰恰不是,如此一来他得以成功打败别人的经验式猜想。

此外,“他者的注视”以主体面对镜子的形式加以实现。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讨论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他人的功能就是镜子。他认为主体对自身的认识有一部分是通过“他人”来实现的,这如同照镜子是人了解自己长相的直接途径。萨特从身体感知出发得出照镜子的举动能够引发“双重感觉”(double sensations)的结论,这颇像“自己的拇指和食指相碰,而这两根手指不能成为彼此真正意义上的对象,因为它们同时作为触摸者和被触摸者、感知者和被感知者,主动的和被动的”。^②这种感觉描述了“我”与“我的影像”之间既彼此影响又彼此间隔的关系。当我们面对镜子做出各种表情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参照镜子里的影像对面部肌肉和表情进行调整,因此人与镜中影像是彼此黏着(adhésion)和疏离(estrangement)并存的关系,此时镜中“我的影像”既是“我”也不是“我”。

萨特在《圣热内》中描写了热内与镜子之间的游戏。小热内的偷窃行为被窥破之后被人们喊做“小偷”。面对如此奇耻大辱,“他不断重复着这个神奇的字眼‘小偷!我是小偷!’然后站在镜子前面打量自己,对着里面的人自言自语‘你是小偷!’”。^③小热内通过这个举动实现自欺行为,即否认小偷这一身份。热内开始写作以后保留了这个习惯,他经常以自己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来到镜子前喃喃自语。这一举动始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意义,即“镜子里的那个人不是我”,他人所说的“小偷”或者小说中的“坏人”不是“我”,而是镜子里的影像,即“我”不是“我”所显现的那样。

以身体为载体、以注视为途径是“我”与“他人”的基本相处模式,“他人的存在”通过其目光使我物化,并使我产生包括羞耻心在内的各种情绪体验,这是导致“我”与“他人”冲突的最

①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第77-106页。

② J.-P. Sartre, L'Idiot de la famille, Gustave Flaubert de 1821 à 1857, Paris: Gallimard, 1988, pp. 680.

③ J.-P. Sartre, 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 Paris: Gallimard, 2006, pp. 53.

初根源。因此这一时期萨特的“他者”观可以用“他人即地狱”来概括。这一时期不仅使《波德莱尔》和《圣热内》的主人公具有这样的特征,包括剧作《禁闭》和小说《恶心》在内的主要人物也表现出这一特征。

三、后期以“集团”为特征的“他者”观

二战结束之后萨特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学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把人的“异化”问题纳入研究范畴,并将之与存在主义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此后萨特逐渐修正早期关于“他者”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架构,学习用辩证观点看待人类生存状况,从人类实践和社会历史的层面解读“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1960年《辩证理性批判》的问世标志着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基本完成,该书集中体现了萨特在这一时期关于存在主义和“他者”的思想成果。萨特后期的“他者”研究有两个突破性结论:一个是“匮乏”导致“异化”;另一个是,群体是“我”与“他人”的共在形式,在群体内部“共在”可以表现为冲突或合作。

萨特认为人类始终在同匮乏的物质环境做斗争,“匮乏”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并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匮乏”具有偶然性(contingence),萨特将之解释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偶然,即无处不在却无理可依,恰如人在世的存在。萨特在这个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本质分歧:马克思主义主张历史的必然性,强调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与不可抗性;而萨特认为,“匮乏”是个体与环境的基本关系。在原始社会,环境更多的是指向自然环境;在其他社会结构里,环境更多指向由人构成的社会环境。萨特重点考察的是后一种情况“在匮乏的环境里,即使个体之间毫不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即使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阶级的各个结构完全切断了相互性,特殊的社会场域里的每一个人仍然存在,并且在其他每一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活动。”^①这段话点出了萨特关于“匮乏”下的人际关系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是人类群体性存在的必然性;其二是他人的在场是现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成为他论证“匮乏导致异化”的理论基础。

萨特通过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原始关系对匮乏的产生进行了解释。他分析了两种可能的生产关系:第一种情况是个人生产的生活资料数量总和略高于集体的生活需要,如果这个集体由一个不从事生产的且人数较少的群体来管理,那么不会出现匮乏的现象;第二种情况是个人生产的生活资料数量总和总是略低于集体需要,匮乏便会产生,从事管理的群体出于生存需要会选择并清除群体中的多余人口。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内部就会产生冲突,冲突成为个人与他人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

冲突中的人是以“非人”(hommeinhumain)即被异化的人的面貌出现,这就是“异化”的产生。“个体的存在被集体内部的其他人置于怀疑中,个人自己的活动也会通过社会环境转而反对他,并作为他人回到他的面前。”^②在群体内部发生匮乏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可能给其余的每一个人造成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是多向可逆的,也就是他人威胁着我的存在,我也威胁了他人的存在。“异化”作为具有延伸意义的社会现象,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以及相关产品变成了消极力量,反过来控制人。萨特认为,人类社会早期的“异化”现象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紧密关联,现代社会的“异化”则是由社会分工固定化导致的。

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的普遍生活方式是群体或集团式的,这就是“共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观点对萨特有很大启发,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分析了“共在”状况并开始对阶级进行思考,至《辩证理性批判》时期他对人的群体形式已经形成了独特认识,并架构起相应的体系

^{①②} 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骥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69页。

说明,同时也研究了人类群体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萨特的研究范畴是集团或群体,但是其研究的出发点以及落脚点依然是个体的人,这一鲜明的特征也能够证明萨特自《存在与虚无》以来所坚持的人本主义思想从未改变。

萨特按照聚合方式和群体的特质对人类群体做了分类,并用不同术语加以定义,如集合体(collectif)、聚集(groupement)等。萨特认为群体“他者”能够决定个体性格的形成乃至命运走向。萨特格外重视研究对象童年时期其家庭以及家庭的阶级属性所产生的影响,这是因为“家庭是在历史的总体运动中、并通过这种运动而构成的,并在童年时代的深处和不透明性中被体验为一种绝对”。^①萨特在《低能儿》中对福楼拜复杂的阶级属性进行了分析。萨特认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即特定阶级的成员必定会具有该阶级的思维模式,那么福楼拜应该过资产阶级的生活,写他应该写的文字。^②但是萨特同时强调个体的特殊性:福楼拜的家庭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深受医学、科学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秉承资产阶级的思维模式:反王权与不信教。而福楼拜与其阶级之间是被动继承与消极对抗的关系。他在童年时期被动接受家庭强加给他的教育,后来为了逃避其父为他安排的职业前途,他以癫痫发作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了豁免权;他渴望君主制度复苏,不顾家族传统明确展示自己的宗教热情。因此,萨特认为,“福楼拜‘固著’(fixation)在他父亲身上,是一种群体结构的表现,是他对资产者的憎恨、他‘歇斯底里式的’发作和他修道士式的志向”。^③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福楼拜的作品中既有深刻地剖析城市小资产者生存状况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与其宗教信仰紧密联系的《圣安东尼的诱惑》。

在《词语》中,萨特进行自我剖析时兼顾群体结构和特殊经历的双重影响。萨特幼年失怙,母亲带他在外祖父家中生活直至再婚。由于父亲形象的缺失,萨特自认为从童年开始从未受到任何约束。然而事实是,其母出身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对萨特影响至深。萨特的外祖父对他采取了开放的教育模式,他从小被允许随意出入外祖父的书房,并进而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萨特年幼时期就开始写作,然而他认为那是孩子取悦成年人的行为,其本质依然是“自欺”:“我的写作不过是装腔作势,是一种仪式,假充大人。”^④外祖父家对宗教信仰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因此萨特没能在童年形成最初的世界观,他将之称为“混乱”。^⑤然而文学取代了宗教的位置,成了萨特的信仰。他这样描述他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作家是我无法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代用品,其唯一的使命即是获得拯救……”^⑥另一方面,当时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大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年的萨特,“这个环境是危机、战争、革命、浪漫、消沉、悲观、无政府主义、混乱、创造、前进、陷入幻想之中、美的追求、恶的猖獗、生命的活力以及死亡的挣扎等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又相互影响的时代”。^⑦因此,我们认为《词语》展现的并非作家的个人成功范例,该作品所示范的恰恰是个人如何在家庭与社会——即群体“他者”的影响下走出自我之路的。

四、萨特“他者”理论的意义及对其的反思

20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各种思潮和理论当中,萨特从“他者”出发对个体命运展开研究可谓独具一格。“他人即是地狱”并不能概括萨特的“他者”思想,且有使人们将存在主义误认为悲观主义的嫌疑。萨特将“他者”理论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相结合,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实践

①②③ 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55、52、56页。

④⑤⑥ 让-保罗·萨特《词语》,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0、178、178页。

⑦ 高宣扬《萨特传》,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页。

中从“他者”的角度对个人命运进行深度解读,这一创举显示了萨特对人之存在的独特理解。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辩证法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大规律作出了总体性的客观总结,而萨特则探索针对普遍规律中个体存在的研究方法。尽管萨特对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称不上真正的有机融合,但在客观上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中的“他者”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益补充。

萨特的“他者”研究尤其是后期对群体的研究,对于理解个体命运有积极意义。个体从来都不是孤独地活着,每一个体都必须存在于人群之中,个体所处的群体类型及其内部组织形式都会对个体命运产生影响。萨特将个体意识和群体观念结合起来用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批判,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个体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人类社会和历史是冲突和复杂的产物,萨特所提供的大量实例分析和总结为我们展示了人类存在方式的多元化表现,他替少数特例与个体存在发出吁请,为之争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萨特主张个人在命运选择方面应该积极“介入”,因为个人在塑造自身形象时总是朝着自己选定的那个形象努力,而个人的选择不论好坏都会给群体带来影响。如果个人形象对于“整个时代都是适用的”,^①那么其对所处的社会无疑会产生良性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样即对自己负责,也对所有的人负责”^②的理念能够对个人和群体命运的塑造产生积极意义。从上述几个层面来看,萨特的“他者”观体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同时也证明存在主义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是符合当下语境的积极的人本主义。

另一方面,萨特关于“他者”的创见中某些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萨特认为“匮乏”引发人类群体关系的紧张化,他质疑剩余价值是阶级斗争之根源的说法,理由是剩余价值说不能解释原始社会的匮乏现象。“马克思很少以一种可以理解的形式来描述史前图式、古代图式、中世纪图式和前资本主义图式。”^③如前所述,萨特认为生产资料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例关系才是导致匮乏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在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持。萨特提出“匮乏”概念的真实目的是力图构架一个普遍适用的逻辑公式,即“匮乏”导致消极共在甚至冲突。这种期待显然落空了,“匮乏”理论无法准确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通过机器实现的生产活动,“一切生产活动都由‘匮乏’引发”的结论并不成立。事实上,萨特所指出的“匮乏”只是一种表象,“匮乏”是“异化”产生的表面原因,而生产关系才是“异化”的根源所在。

萨特关于“匮乏”的观点直接导致他对群体关系的某些消极认识。国内有学者指出萨特的群体理论体现的是悲观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在他的眼里,历史的可理解性,不过是一种消极的相互对抗的历史”。^④这个说法有一定根据,因为在萨特的群体理论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而且人群聚合的原因是来自于对匮乏的恐惧;在集团内部,维持结构稳定的最有效方式是恐怖手段,而恐怖手段的本质就是将个体与绝大多数区分开来。萨特自己也说过“人类关系的唯一的可理解性是辩证的,这种可理解性,在其真实基础是匮乏的具体历史中,只能作为一种对抗的相互性表现出来。”^⑤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导致萨特这一结论的根源在于他未能走出“我思”的迷局,力图用每一个主体的集团和时代取代无时间的意识;萨特执意在原始与文明之间寻找差异,他假定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具有狭隘性。^⑥

①②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9页。

③⑤ 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282、1000页。

④ 张一兵《扭曲的共在:群和集团——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解读》,《理论探讨》2003年第4期。

⑥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6页。